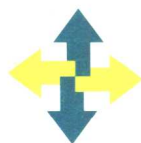


论中国经济发展 与经济稳定化政策

李 建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论中国经济发展 与经济稳定化政策

李 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化政策 / 李建著.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11
ISBN 7-309-03766-9

I. 论... II. 李... III.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9618 号

论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化政策

李 建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李 华

装帧设计 陈 萍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9-03766-9/F · 808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作者 1989 年在德国曼海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中国在摸索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上——一个中国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节译本与 2003 年中文本前言——《目前中国经济稳定化政策中的一些问题》组成。作者在其博士论文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特别是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二级银行制度货币部门模型,证实了中国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着经济稳定化政策,分析了中国经济决策者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各种决策行为。作者在中文版前言中指出,中国近 14 年来的经济发展以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成功实践,证实了作者早期的分析:经济稳定化政策是一项制度中性的经济政策,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者能够在各种复杂条件下,迅速准确地对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并且实施各项有效措施。作者据此提出实现经济稳定应当作为中国经济政策目标体系中首要目标的观点。以这种“稳定经济第一”的思想为基础,作者分析了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提出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目前实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将能够继续保持成功的观点。

序 言

陆德明

我的大学同窗李建博士要我为他的《论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化政策》一书作序,我欣然从命。正如李建自己在他的中文版导言中回忆的那样,25年前我们走进复旦大学校门的时候是何等的幼稚。许多同学当时怀抱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有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体系的雄心壮志。李建先生大学毕业后被公派留学德国。1989年他在德国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国在寻求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上——一个中国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由于是用德文写成的,因此我们国内同行无法具体了解。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以节译本的形式出版,并且由李建博士加上一个很长的中文版前言终于面世了。在这个中文版前言中,李建博士阐述了对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理论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等许多重要问题的独特观点。

首先李建博士提出了坚持经济稳定应当在中国经济政策目标体系中始终具有优先性或者“稳定第一”的经济思想。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政策理论研究中极为少见的。李建博士指出了这个命题的普遍性,认为在现有国内外各种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理论中一般均存在一种“二分法”或者至少将其作为暗中假定的前提,即在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或增长)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此长彼消的相互替代关系。尽管它的理论基础之一菲利浦曲线早已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证明不能成立。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

来讲,“增长第一”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李建博士从他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验研究角度出发,指出“增长第一”理论至少有一个暗中假设的前提,即普遍存在的那种担心——中国经济不能高速发展的看法,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业绩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他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国民储蓄形成过程,提出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储蓄能力,这可以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中国能不能高速发展,而在于中国经济能不能保持稳定发展。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即使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也存在着经济稳定化思想与经济稳定化政策。他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检验并证实了中国经济稳定化思想与政策的存在性及其有效性。

国内从1990年代中期提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以来,虽然经济稳定化政策的存在性和必要性开始被大家逐渐接受,但在中国经济政策理论中,这种经济稳定化政策的地位问题实际上至今并没有人系统地提出和论证过。因此,我认为李建博士的这本书是开拓性的,将促进人们对中国经济政策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李建博士长期以来对中国货币制度问题具有浓厚兴趣,一直关心着人民币汇率制度决策中的有关问题。他在前言中对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值得读者重视的是,他从非瓦尔拉均衡的角度出发,预测中国的国际收支将长期相对稳定地存在出超,并且指出了中国当前国际收支中面临的“双顺差”有着许多中国特色。因此仅仅按照西方流行的标准观点是无法对中国国际收支问题提供有充分说服力的解释的。他预言中国目前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或者实际上对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将长期存在下去,为此提出了一些人们在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时所忽略的因素和命题。例如正因为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它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对国内经济进行调整,从而为长期有效地继续实行目前这种实际上的固定汇

率制度提供了基础。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例如“一国两制”与“两岸四地”即中国内地与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关系等因素,决定了中国必须坚持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个最高政治目标。而这大大地限制了中国决策者在是否应当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上的回旋空间。我认为从方法论角度讲,李建博士的分析确实是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关于货币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的,根据中国当前面临的极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他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独特的见解,其中包括建议加速在上海建设国际债券市场的设想。这些都对中国经济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感到李建博士能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与中国经济政策研究中的主流观点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看法,是和他拥有坚固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经验分不开的。1980年代他在国外时就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认为研究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货币部门也应当采用二级银行制度的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在经验研究中证实了中国的中央银行或中央决策者能够对宏观经济稳定做出迅速反应。他建立了一个当时相当完整的货币部门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中国的货币创造过程和各个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并且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否定了当时流行的赞成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观点。他的研究方法是将中国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本书中体现的这种方法将对我们国内同行带来诸多教益和启发。

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获益良多。我希望李建博士能够继续他对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继续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25年以来的伟大实践进行规范的经验研究,并进一步阐述和证实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

于复旦大学

2003年8月28日

目 录

序言	陆德明 1
----------	-------

目前中国经济稳定化政策中的一些问题

——代中文版前言	1
----------------	---

德文版导言	67
-------------	----

第一章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民收入的使用和经济波动

1.1 国民收入中的储蓄形成过程和投资率	71
1.2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波动	86

第二章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2.1 导言	111
2.2 经济发展政策的政策工具	117
2.3 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储蓄形成的巨大差别	123

第三章 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经济稳定化政策

3.1 计划经济中的国民经济计划与经济波动	131
3.2 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和经济稳定化政策	137

第四章 中国的货币部门

4.1 导言	164
--------------	-----

4.2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二级银行制度的 存在性问题	170
4.3	对中国货币体制和货币体制政策的一些注解	172
4.4	计划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	176
4.5	中国的货币计划	212
4.6	中国的货币政策	233
4.7	中国货币冲击传递机制中的一些问题 ——论信贷市场的数量配给问题	249
4.8	本章总结	254
第五章	中国实物经济部门的计量经济模型	257
5.1	导言	257
5.2	一个关于中国居民家庭部门的消费品需求系统	266
5.3	投资函数	280
5.4	价格	293
5.5	收入分配和再分配	307
5.6	本章总结	309
第六章	中国货币部门的计量经济模型	311
6.1	导言	311
6.2	中国非银行部门在货币领域中的需求行为	313
6.3	中国信贷机构的行为	355
6.4	中国的中央银行行为	374
6.5	本章总结	384
	中文参考文献	386
	外文参考文献	389

目前中国经济稳定化政策中的一些问题

——代中文版前言

(一) 探索中国经济稳定化政策

1989年我在德国曼海姆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在当年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同窗好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教授的帮助下;在其他老同学如周伟林的一再鼓励下,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徐惠平先生和李华先生的热情帮助与辛勤编辑下,终于能够以中文节译本的形式通过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阅读完清样,我思绪起伏,感慨万千。在25年前的1978年年初,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期大学生,我进入了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又有幸能够作为教育部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赴联邦德国(原西德)攻读博士学位。作为主课,我们曾经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在复旦大学能够更多地学到一些当时极其“稀缺的”当代西方经济理论,能够有幸直接聆听到宋承先教授的授课,并且毕业以后成为他的研究生。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只有一股热情,认为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通过提高“计划水平”,中国的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因此,我在选择进入哪家德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请哪位德国教授担任导师的时候,认识都是朦胧的,心想只要能够学习数量经济学(当时只知道投入——产出分析和计量经济理论,在国内大学里还没有相应的课程)就行了。作为“文革”以后教育部派出第一批赴德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

生,联邦德国的政府部门对我很重视,并且为我安排了德意志海外学术交流协会(DAAD)的奖学金,请正在担任德国曼海姆大学校长的柯尼希(Heinz König)教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作为著名经济学家霍夫曼(W. Hoffmann)学生的柯尼希教授是德国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如今他的许多学生已成为德国许多著名经济研究机构的领导,例如在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所长茨姆曼(K. F. Zimmermann)教授,在慕尼黑的依福(IFO)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福莱格(G. Flaig)教授,以及他在退休以后亲自创建的德国最大的民办经济研究所——与德国曼海姆大学合办的欧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前德国经济五贤人委员会成员弗朗茨(W. Franz)教授,等等。

1982年秋天,仅仅学习了六个月的德语课程以后,我就在曼海姆大学国民经济系高年级学习了。说来惭愧,在德国我花了大约六年多的时间才学完高年级课程和研究生课程并获得博士学位。和1980年代的许多公派留学生相比,我的学习时间比较长。一个原因是由于德意志海外交流协会的大力支持,我可以在经济上没有困难的情况下潜心学习。又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国内相比,在德国那种极其强调学术自由的氛围下,我在主观上也逐渐地丧失了原先那种时间紧迫感,感到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完一篇论文就获得博士学位。在西方长时间的学习与生活使我逐渐认识到,像我们这一代在一个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计划经济国家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来到联邦德国这个西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会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方法等领域不可避免地每时每刻经受种种冲击。对我来讲,这也算是一个逐步“脱胎换骨”的过程吧。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我开始对当时正在国内如火如荼进行的改革开放逐步地进行系统的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课题应当如何确定?为了选定博士论文的题目,我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当时在海外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

大多选取与中国经济改革有关的各种课题作为博士论文。起初我希望单纯地制作一个中国的宏观计量模型,因为我的导师柯尼希教授就是德国第一个宏观计量模型的制作者。但是要建立中国的宏观经济模型就需要拥有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这个问题直到 1985 年以后,才能够从较为完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逐渐公布资料中得到解决。但是,即使在我的计量经济模型基本完成的时候,中国货币部门的数据在当时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中仍然是很不完整的。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为了能够在国外搜集更多进行中国经济模型研究必需的时间序列数据,我快成了像许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那样的“汉学家”。我阅读了几乎所有已经发表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德语和英语文献。在国外这种特殊条件下,我一方面阅读分析外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和现状的研究资料,一方面作为中国留学生又必然时时刻刻关注国内经济改革的一举一动,再加上本人性格也许比较“偏执”的缘故吧,无论在博士论文的课题确定、立论和论证过程中,我并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样,过分强调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旨在研究“中国为什么需要和能够成功地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问题。特别是进入 1986 年我正准备写论文的时候,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提出了改革的思想。当时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立即讨论这样的问题,究竟谁能够成功地进行体制改革,是中国还是前苏联?许多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已经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前苏联将很难甚至不可能像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那样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我对戈尔巴乔夫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表示怀疑,认为戈尔巴乔夫提出这条改革路线也许本人意在“补天”,但是他那种以全盘西化为指导思想的改革,结果很可能是“拆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基本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即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是中国真正能够通过改革开放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惟一道路。正是在这种基

本指导思想下,我在对博士论文不断进行修改的过程中最后决定将论文的基调定在强调“中国特色”上面,即从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从一般和特殊的统一关系出发,分析中国为什么需要而且能够在经过十年“文革”动乱以后,1978年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逐步地发展起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既能够实现大规模改革开放又能保持社会稳定,即设法努力揭示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必然性或“秘密”。因此,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最后定为《中国在探索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上——一个中国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我提出的观点主要是:中国能够取得改革开放成功的极其重要原因在于,世界各国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或现代化过程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本身实际上是制度中性的。在1949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为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经济道路进行了反复的实践,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这种寻找中国自己独特经济发展道路的努力,从发展政策方面来看,首先反映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论十大关系》实际上初步形成了以后二十年间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断进行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当时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此外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一大批以陈云同志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工作者,几乎在与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同时,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三大平衡”的思想。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形成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起来。正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从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获得改善,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开始变得有利于中国加强对外经济联系,为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动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动因和基础。

因此,中国从1978年以后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经济成就,实际上都是“厚积薄发”,是中国共产党人过去近三十年不懈努

力的结果。

我在博士论文中并没有强调 1978 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革命”一面,而强调它的“连续”一面,其理由如下。论文首先概括地描述了中国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与增长过程,重点分析了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以及中国国民储蓄和投资的发展变化及结构特点等等方面,将其作为整个研究的出发点。原来的博士论文计划仅仅是建立一个中国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但是为此我就必须向我的德国导师们详细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表述的形式又必须完全按照欧美流行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通常采用的形式。这样在写作过程中,我逐步地放弃了原来计划在博士论文中单纯地提出一个宏观计量模型的想法。结果最终递交的博士论文篇幅几乎翻了一番,并且将计量经济模型从原来设想的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逐步转变为作为一种实证工具,来经验地证明本人所提出的各种基本观点或假设,这也构成了本论文与当时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发表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有重大区别的地方:

一、中国的生产要素结构具有它的特殊性,指出“东亚经济模式”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

二、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经济政策优先目标应当是“经济增长(发展)第一”还是“稳定第一”的分歧和争论。

三、即使在实行经济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稳定化政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已经相当完整了。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那种普遍流行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应当坚持增长优先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影响,坚持稳定优先的经济思想被认为是一种“保守”的经济思想,遭到人们的忽视和否定。

四、如果中国存在经济稳定化政策及其实践,我们是否能够从经验研究上证实这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客观存在性,或经济决策者的这种稳定化意志是否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要求实现宏

观经济稳定的意志是否是中国宏观经济能够真正实现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

五、要通过经验研究来证明中国确实存在经济稳定化政策，就必须正确理解中国或其他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货币部门。这样提出二级银行制度作为方法论是极其必要的。

六、在处理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关系时采用了一些独特方法。例如在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通过对计划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消费品配给供应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居民部门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仍可以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样，认为居民部门的决策行为是合乎理性的，并且以此为基础系统地进行了分类消费品的研究。

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我的主要兴趣逐渐地转移到如何构造一个完整的中国货币部门模型，而不是像通常的研究那样仅仅局限于研究货币需求函数。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国货币部门的模型，就必须提出二级银行制度的客观存在性在理论分析中的重要性，而且必须在经验研究中能够提出并且证明确实存在中央银行行为函数或反应函数，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完整地研究中国的货币供给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它的客观存在性，也就为证明在中国存在着宏观经济稳定化理论和政策奠定了实证基础。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存在着一条稳定的以经济稳定化为导向的中央银行反应函数，那么也就证明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的这种活动方式与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的活动方式实质上是相似的，至少二者之间是可以进行比较的。这也就意味着经济稳定化政策是一种制度中性的经济政策。

这样我还必须针对当时在国内正在逐步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赞成通货膨胀政策的观点和主张，在博士论文中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驳斥。当时流行的通货膨胀政策主张的基础之一，是正在热烈讨论的所谓中国经济“货币化”问题，我在论文中是这样来进行

证伪的。首先,在宏观经济的运行中,货币资金应该与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储蓄和投资以及资本存量有着密切联系。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角度来看,货币的产生与发展能够提高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效率。因此,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货币化”进程的发展只能相对减少而不是提高用于流动资金或库存投资的资源在整个投资中的比例。在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中国的农民能够而且愿意迅速地大规模地增加货币资金的使用而不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自然经济方式上,就意味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因此,货币发行增长率超过 GDP 增长率并不意味着人们长期稳定的或者理性的货币持有行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在经验研究部分中指出,引进农村货币化概念不能作为中国在 1980 年代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现的急剧的货币化过程中,中国居民部门的货币需求行为实际上仍然是稳定的。因此,货币数量论公式也不应当轻易地被否定或怀疑。中国当时的货币增长率过高,实际上主要是经济政策又一次转向经济发展与增长优先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当时的具体环境,在国外的特殊条件下我不愿直接明确地指出,这种通货膨胀的出现实际上是当时国内那种错误的经济发展思想的结果。

我在博士论文中反对当时国内流行的一些观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德国经济与社会的具体背景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德国经济,在成功地消除了 70 年代二次石油危机和布雷登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出现的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冲击以后,恰逢美国实行高利率政策,美元的坚挺或高估为以出口为基础的原西德经济带来了相对长期的繁荣。德国中央银行能够成功地将其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加以贯彻执行,增强了德国民众对这种货币政策的认同感或形成了对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的共识,提高了德国联邦银行在德国政治生活和欧洲经济

共同体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也为 1990 年代建立欧元和加速欧盟一体化提供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强大的德国马克也是 1989 年以后苏东地区发生巨变,并且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重要经济力量或经济原因。当时担任德国联邦中央银行五位常任理事之一并负责马克汇率事务的盖莱西格(L. Gleske)教授正在曼海姆大学的经济理论与政策高级进修班授课,主要内容都是当时德国和世界经济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特别是联邦中央银行的各项具体政策决策过程与业务操作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正是这些课程,使我这样一个在基本上是封闭的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留学生,在联邦德国这个市场经济特别是对外经济最发达的西方经济中心的环境里,逐步理解了“汇率”以及汇率政策等等基本概念和理论,了解了德国具体操作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方法,从而真正认识到货币政策在一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对欧美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家在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如何进行交往和各种趣闻轶事,对这幅如此缤纷复杂的图画开始有了一种逐步深化的形象化的认识。前联邦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Emminger)的回忆录书名就叫《保卫马克》,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阅读这本书时所感受到的巨大震撼和冲击。这本书使我认识到,上世纪 70 年代世界经济发生动荡时欧美主要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决策与执行者特别是各国中央银行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交往活动,充分反映了一国的汇率政策或制度安排都必须服务于本国的基本经济利益,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正在成为高度开放经济条件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主要的经济政策之一,汇率政策正在成为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保卫人民币”实际上也应当是中国经济决策者必须公开提出和坚持的口号,这就是我在当时取得的认识。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实行经济改革以前甚至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并没有构成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决策内容。但是,保卫人民币的内部价